

20141005 為什麼我要離開沙發走上街頭: 黃國昌(Kuo-Chang Huang) at TEDxTaipei

1991年在臺灣，動員戡亂時期畫下了句點，萬年的國會也走到了終點，在世界上我們看到了蘇聯的解體，戈巴契夫也下台了，在冷戰結束以後，我們似乎正在迎接一個新的年代，自由民主陣營的勝利使得一位美國重要的學者，Francis Fukuyama，他在他著名的著作當中《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聲稱人類的歷史已經走到了盡頭，自由民主的制度已經獲得了勝利，於此同時1991年，臺灣教育部的Internet也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接連上了，臺灣正式成為網際網路的一員，從此開始資訊的發達以及爆炸，臺灣也真正成為一個半導體的王國。

1991年為什麼重要？那一年是我入大學就讀的那一年，但是這不是重點，在1984年所出生的人，從1991年開始邁入了小學的教育時代，從1984到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臺灣每年的新生兒出生人口數已經降到35萬以下，每年的出生率也降到1.5%以下，在這個20世紀最後的這個世代，我說的是從1980年代初期一直到21世紀初期所出生的世代，有一些學者把它稱之為戰後嬰兒潮，X世代以後的Y世代，有一些人認為是所謂的Internet，就N世代；也有一些人把它稱之為千禧世代。

在這個世代當中，我們看到的是這個世代的年輕人他們生長於一個小家庭，一個出生率下降了以後的小家庭，他們的父母延著既有的規則不斷努力地工作向上爬，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相當好的環境，不管是受教育的普及還是教育的品質，比上一個世代大幅成長了，進步了非常的多，我們也看到在這個世代的年輕人，他們承繼著在前一個階段前人努力經濟成長的果實之後，他們除了享有更好的生長環境，他們從出生開始也呼吸到了自由民主的空氣，網際網路的發達更使得他們對於資訊的接近，對於娛樂的取得比上一個世代的人幸福幸福太多了。

這一切讓我們似乎都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值得欣喜的理由，但是他們所面臨的現實真的是這個樣子嗎？當他們開始步入了社會，成為社會的新鮮人之後，他們所面臨的是高房價，一個他們可能努力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承擔的一個生活休息的殼，在台北市房價薪資所得比已經來到了15.6，這些年輕人要15年不吃不喝才有可能在這個地方找到一個窩。

在這個同時，在全球化經濟的發展下，在新自由經濟主義的發展下，他們面臨的卻是低所得，臺灣在跟中國進一步經濟統合的過程當中，生產要素的均價也就是勞力，不斷地下降，這些年輕人開始發現了，他們所迎接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同時他們從小到大視為理所當然一個自由民主的制度，也在他們成長的生活經驗當中，

遭受到了劇烈的衝擊，他們看到了這一個政府如何配合著財團在進行圈地，透過不正義的程序可以拆除別人賴以維生幾十年的家，都更的發展，農地的濫行徵收，讓他們看到了在這個社會當中存在著這麼多不公不義的宰制結構。

在政治上沒有歷經白色恐怖，沒有歷經戒嚴時期的他們也很難想像到，在台北的街頭他們可能只是揮舞著自己國家的國旗，卻會面對警察暴力的毆打，2008年整個台北街頭，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公民在一個和平抗議的集會當中，頭痛血流，面臨到了國家集團性的暴力行為，他們很難想像，他們沒有辦法相信這是他們成長的世代嗎？這是他們要去迎接的社會嗎？

在這段期間當中，臺灣的經濟並不是沒有成長，從1980年代開始，到現在的2014年，臺灣的GDP，年均的GDP不斷地往上提昇，但是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在邁入21世紀之前，我們卻看到了一個清楚的趨勢，那個清楚的趨勢是，經濟的成長跟個人薪資的所得開始出現了嚴重的脫鉤，所得的上升比不上物價上漲的趨勢，這一些年輕人畢了業，踏入了社會以後，開始面臨了沉重的社會壓力。

在這個結構下面，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世代，反而是一個困頓的世代，一個迷惑的世代，一個不知道如何才能夠掙脫在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架構下面，四處流動跨國的資本，而當這些資本進入了臺灣，進入了其他國家的市場之後，他發現了這些財富創造了新的一批的權貴階級出來，透過國家的權力取得很多特許行業，從金融到電信到電子媒體，而這些新的權貴集團、新的權貴階級他所帶來的在政治面上面的影響，是讓我們看到了所謂金權政治的復辟，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民主政治已經不是「One Person, One Vote」的時代了，我們所面對的是「One dollar, One Vote」的年代。

在這個宰制的結構下面，我們面臨了沒有辦法想像的在形式上面是民主，在實質上面卻是獨裁的一個政府治理的結構，面對這樣的困局，我們新的世代到底應該如何地選擇？到底應該如何地前進？我們到底應該成為一個精於計算的利己主義者，循著既有現存的遊戲規則不斷地往上爬，還是我們應該追求一個共善的公民主義，透過集體的力量打造一個新的政經體制？

有很多朋友或許會認為這是一場保守務實跟浪漫理想兩者之間的對立，但是我要說的是，這不是這兩種價值的對立，而是當你以為你透過保守務實，循著既有的遊戲規則慢慢往上爬的時候，你將會發現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繼續地鞏固、

繼續地強化這個本來就已經陷入不公不義的體制，在這個規則當中，努力冒出頭來的一些人，當他們取得了權力，當他們可以支配這個社會的時候，各位可以很容易地想像，這樣子的統治者、這樣子的領導人會用什麼樣的心態或用什麼樣的政策繼續引導這個社會前進，他不僅不會打破這個不公義的現象，他只會進一步強化、進一步鞏固這個他已經熟悉的，他已經知道如何玩弄的遊戲規則。

如果說我們透過集體的力量，來去追求一個新的政經體制，我們或許，我們或許可以看到希望，我們或許可以出現一個不一樣的社會，不一樣的環境。

在過去的這段期間當中，我們看到了這種共善的公民主義，這一種公民集體的行動是有可能造成改變的，當所有的人都不認為少數的幾個學者、一些學生有辦法阻止在臺灣已經有相當高政治影響力的媒體集團去進一步併購臺灣的有線電視市場的時候，一場反媒體壟斷的運動把這件事情給擋了下來，當所有的人認為在軍中這些不合理的制度，許多服役的年輕人在軍中遭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對待，喪失了寶貴的生命，葬送了靈魂，1985透過25萬人在凱道上面的集結，他們不僅追求了公義，也打造了臺灣嶄新的軍事審判制度。

當我們的政府不願意傾聽人民的聲音，不願意遵守民主審議的原則，透過30秒的時間，片面宣布了一個從來在國會裡面沒有被討論，沒有被實質審議的服貿協議已經視為審查通過了，臺灣的新世代、臺灣的年輕人、臺灣的公民社會衝入了立法院，透過最具體的行動告訴這個政府，這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民主體制，他們的勇氣、他們的行動不僅暫時阻擋了服務貿易協議，同時也開啟了從2008年以來，我們的政府一直不願意建立的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工作。

在最近我相信在場的各位朋友都非常關注目前發生在香港的事情，香港所面臨的環境、所面臨的挑戰比臺灣更困難，比臺灣更艱困，但是我們看到香港的學生、香港的新世代他們沒有放棄，他們也沒有選擇逃走，他們知道香港是他們的家，他們未來他們的子孫都要繼續地在這塊土地上面去追求他們希望過的生活，我不知道在最後的結果上面，從形式的目標來講，香港的朋友會不會成功，但是我相信透過他們具體的行動，透過他們公民抗命的吶喊，香港的社會從這場運動以後已經變成不一樣。

韋伯曾經說過：「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去追求世界上不可能的事情，我們連有可能的事情都沒有辦法達成。」他也曾經說過：「一個好的領導人他必須要有熱情，

要有責任感，要有判斷力。」但是對於我而言，不管是理想、責任感還是判斷力都是我們這一代新生代的朋友必須要具備的特質，擁有這樣子的特質，我們才能夠有勇氣、有智慧地面對新的挑戰。

這一些核心的基本價值，我相信對於在座許多朋友來講都不陌生，我們在追求這些共善的價值，希望可以像一個人有尊嚴的在這個社會上追求自己理想的時候，我邀請大家在前面的同時，要記得下一代的人正在看著你的背影，你前進的步伐會帶給他們信心，會帶給他們勇氣，讓他們面臨下一個階段可能是更嚴峻的挑戰，謝謝。

(掌聲)